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许地山

XU DI SHAN

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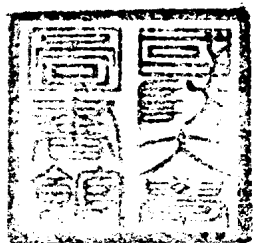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许地山代表作

邱文治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曲哲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许地山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西里路94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260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统一书号：10385·105 定价2.85元



作 者

廿三年五月我定軍庫長
口旋報飛來喜不賦此
排雲飛將數金戈破敵霧霄震
九天護國丹心垂宇宙何求遺象
在凌煙

許世英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307.15
2

17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羡璧

前 言

许地山，名赞堃，笔名落华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著名作家。他像当时那些追求进步的作家一样，怀着爱国的和民主的思想，探索人生的意义，并且随着时代的激流，荡涤自身弱点，消除迷惘情绪，逐步明确了前进方向，找到了人生意义的真谛，以坚实的步伐走上人民大众的战斗行列。

许地山的创作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期。五四至一九二七年为前期，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和散文小品集《空山灵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逝世为后期，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危巢坠简》和一些剧作、童话、杂文等。许地山由于辗转南国和异域，采用的题材新颖独特，加上渗透在作品中的独特人生哲理，被茅盾称为“独树一帜”的作家。

许地山，一八九三年出生于台湾的一个官宦家庭。甲午战败后，台湾被日本侵占，许地山父亲出于爱国义愤，舍弃财产，全家渡海落籍福建。许地山因家道中落，在青年时期就外出谋生，辗转于缅甸、仰光和福建漳州等地。一九一七年他到燕京大学读书，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倾向，并成为文学研

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在五四时期曾经流行“问题小说”，即在小说中探讨人生哲理，作家们根据各自的生活态度，对人生问题作出各种回答。如在温柔的摇篮中长大的冰心，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爱”，即母爱、童心和自然组合的“爱的哲学”；卢隐则由于坎坷的境遇，认为人生的意义是“憎”，她愤世嫉俗，悲观消沉。许地山既不同于冰心，也不同于卢隐，他的人生态度是属于第三种类型。

人生的问题是什么？许地山的回答是“生本不乐”，他在《空山灵雨·弁言》中说：“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这虽然说的是个人遭遇，但也包含着广泛的社会人生内容。他以真挚深沉的笔触，在创作中表现当时苦难的人生。

通过婚姻和家庭问题揭示人生苦难，是许地山前期小说的主要内容。《命命鸟》描写一对热恋得像“玫瑰和蜜蜂”似的青年明敏和加陵，由于家长的阻拦而双双殉情。小说在貌似冷靜的刻画中蕴藏着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控诉。《商人妇》的女主人公惜官资助丈夫外出谋生，可是丈夫在外发了财，另有新欢，把千里迢迢寻找他的惜官卖给印度商人做第六妻，惜官受尽人间苦难，无法返回故国。小说以凄婉的笔触表现了妇女的苦难命运。《缀网劳蛛》是许地山前期的代表作。女主人公尚洁有普济众生的良善心地，却遭丈夫的猜忌，误以为不贞，先则蒙受刀伤，继则被逐出家门，连个人的积蓄和唯一的女儿都被剥夺。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夫权的暴虐。此外《枯杨生花》等小说，也深刻暴露了封建习俗的残酷和旧礼教对妇女的戕害。

越过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狭小范围，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虑人生苦难的，是他的散文小品集《空山灵雨》。这些散文最初连

载于一九二二年的《小说月报》，曾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开卷第一篇《心有事》，吐露了作者悲苦难抑的心绪：独对空山，难以成眠，“积郁成泪，泪又成川”。这既是个人颠沛流离之苦的倾诉，也是社会人生之苦的反映。《万物之母》、《荔枝》揭露封建军阀草菅人命、掠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暴行；《公理战胜》谴责帝国主义战争；《面具》、《乡曲底狂言》嘲讽人心的虚伪。在险恶的社会中，人生有如《海》所描写的狂涛激浪中的沉舟；有如《蝉》所揭示的被雨水浇落地面的寒蝉，随时有可能被野鸟吞食的危险。因此作者在《债》中不无偏颇地认为：“生命是缺陷的苗圃，是烦恼的秧田。”

面对如此苦难的人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许地山通过创作表现了自身难以统一的复杂的思想矛盾。

首先是献身精神和无力济世的矛盾。在许地山的人生观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这就是造福于人民的献身精神。他的真诚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使他深刻地同情人民的苦难，希望竭尽全力帮助人民摆脱困境。这在散文《愿》、《生》和《落花生》中得到富有诗意的表露。《愿》把自己比作调味的精盐，愿“形骸融散”，“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生》把自己比作一棵龙舌兰，供小鸟和昆虫栖息，不惜自身日后的“零落”。著名散文《落花生》则强调做人要象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应该说，这种不求名利、不求闻达的献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传统，作者以落花生作为笔名，就是表示要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这种精神。在《债》中，他觉得欠了贫苦人“无量的债”而无力还债。他希望找几个人帮忙，可是又难以找到，人们象《蜜蜂和农民》中的农民，“各人自扫门前雪”，还不如蜜蜂能够“大家帮帮忙”。他甚至感到，自己的良好愿望也会

遭到人们的反对，散文《光底死》描写一心为众生谋利、普照万物的光反遭人间“智者”排斥和咒诅的情形，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其次是顽强挣扎和乐天安命的矛盾。面对险恶、苦难的人生，许地山在作品中表现了坚韧不拔、顽强挣扎的精神，他不安于命运的摆布，拼力与命运搏斗。《商人妇》中的惜官，孑然一身，飘流国外，历尽艰难，但她说：“不但不愿死，而且还留着这条命往前照照我底命运是怎样。”《海》描写大船沉没，恶浪翻滚，但人们仍凭一叶救生小船，在茫茫大海中尽力划行。然而许地山这种不安于命运摆布的人生态度又与他淡泊恬静、乐天安命的宿命思想互相表里。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尚洁的人生哲学中。尚洁把自己的命运比作蜘蛛织网，她说：“我象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而这个命运之网，她认为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别人恩赐，而是“自己织得来”的。这表明她不受命运的束缚。但是她又认为，“那网什么时候破，和怎样破法”，人是无法知道的，“只能听其自然”而已。这又陷入了消极的宿命论中。惜官的思想本质上和尚洁一样，她抹杀了苦与乐的界限，把被卖与受人蹂躏当作一种快乐的回忆，实际上是宿命论的曲折表现。许地山在《复诵幼》中说：“人到无求，心自清宁，那时既无所造作，亦无所破坏。”这正好与他的积极挣扎的人生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三是执著人生与否定人生终极意义的矛盾。面对苦难人生，许地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悲观厌世思想，有时甚至完全否定生的意义。《命命鸟》的结尾宣扬涅槃的圣洁，《鬼赞》赞美死亡的快乐，《愚妇人》强调人只有绝嗣才算“有福”。其它如《山响》表示要“早早休息”，《疲倦的母亲》连孩子的歌唱都

引不起母亲的兴趣。在《债》中他借容融之口表示：“要补修缺陷，拔除苦恼，除弃绝生命外，没有别的道路。”但是许地山又有执著人生、积极达观的一面。他在《春的林野》中把生活写得春意盎然，朝气蓬勃，洋溢着旺盛的青春活力；就是赞扬死亡的《鬼赞》也强调“有声就得尽量唱”，“有事就得尽量成就”的积极奋进的人生态度。其它如《梨花》、《桥边》、《香》、《愿》等散文描写了夫妇之间的爱和少女的情愫；《笑》、《爱就是刑罚》、《美底牢狱》、《你为什么不来》等均表现了对人生的执著和肯定；《别话》、《我想》、《爱流汐涨》这些描写死别与悼亡的小品，也都洋溢着创造幸福的诗意。至于《七宝池上的乡思》，更以凄婉哀伤的笔调描绘升入天堂的少妇对生活在人世的夫君的相思，把“极乐世界”视为愁苦孤寂的冷宫。

总之，在许地山早期的思想中，奋进与退缩，昂扬与消沉，坚韧与柔懦，乐观与迷惘，欢快与厌世等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因素相互交融在作品之中。他在崇高的献身精神中时时发出无力济世的叹息，在与命运抗争中渗透着宿命的凄清，在执著于人生中流露出绝望的悲鸣，许地山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人。

许地山这种矛盾的人生态度，既有时代和阶级的根源，又有他个人独特生活经历的直接原因。

汹涌澎湃的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他本人“屡遭变难”的生活际遇，使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同情劳动人民的命运，产生献身于人民的崇高思想。他青年时期有过宗教信仰，并立志要探讨各种宗教的教义，因此早期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佛教“普济众生”的教义，就与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相沟通，渗透在他的献身精神中。但是，许地山早期创作的旺盛时期，正是狂飙突进的五四革命潮流逐渐低落，而另一次革

命高潮尚未到来的低潮时期。这时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于社会的黑暗，但又一时寻不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因而感到孤独、苦闷和空虚。甚至象鲁迅那样刚刚呐喊过的坚强战士，也感到一种文苑的寂寞荒凉与“荷戟独彷徨”的悲哀，象郭沫若那样叱咤风云的革命骁将，也满怀忧郁地倾饮着“苦味之杯”，何况对社会生活实际缺乏了解的许地山，就更是不能例外。

许地山还有其个人特殊的生活际遇。一九二〇年，他的心爱的妻子林同森突然客死旅途，留下一个幼女，悼念亡妻的凄凉生活加剧了他思想的苦闷和矛盾，加上他正在潜心研究宗教义理，宗教的消极思想必然要影响他的人生观。应该指出，许地山不是宗教的信徒，他不迷信天堂地狱之类的说教，他的执著的人生是与佛教“苦空二谛”之说相违背的。他有十余篇散文都是写夫妻之情的。《别话》中的妻说：“人要懂得怎样爱女人，才能懂得怎样爱智慧。”可是佛教把智慧称为“般若”，佛学即“般若”学，“般若”实为佛学的灵魂和进入天国的钥匙，“通晓佛法为智，断惑证理为慧”，必须持戒正定，累年修行，方能领悟，而惑之大者莫过于性爱，所以佛教提倡禁欲，佛子必须出家。可是许地山却强调夫妻爱、儿女情，这实际上是否定佛教的“般若”。但是宗教里关于义理的淡泊恬静、超脱人世、宿命观点，甚至厌世思想，在当时许地山的生活际遇中，也不能不影响着他的人生态度，这就构成他的人道主义与佛教消极思想的矛盾，因而他无力解决人生问题，他对人生意义的回答只能是无可奈何的“生本不乐”。

二

一九二三年，许地山去英、美等国留学，一九二六年回国，一九二七年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许地山回国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淋漓的鲜血中，他看到了社会各种人物的真相。如果说前期小说题材基本上局限于家庭生活，很少涉及政治问题，被人称为“夫妻文学”的话，那么后期小说的题材就大大扩展了，他把民生疾苦与政治事变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在费总理底客厅里》是许地山归国后所写的第一篇小说。小说揭露了反动资本家费总理原先投靠北洋军阀，后来又投靠国民党的罪恶。他以“急公好义”为幌子，攫取慈善事业捐款，强占民妇，草菅人命，而居然逍遥法外。《三博士》讽刺了那些到国外镀金的洋博士，他们花天酒地、不学无术，却到处招摇撞骗。《无忧花》抨击了一个交际花的无耻行径。她与国民党官僚相勾结，侵吞公款，最后投靠帝国主义分子，逃往国外。这些作品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那些压迫者、剥削者和各种寄生虫的强烈仇恨。与之相应的则是作者对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街头巷尾之伦理》描写一个孤苦伶仃的瞎子遭人蹂躏的故事，揭示了世态的炎凉。《归途》描写一个寡妇为穷困逼迫而拦路抢劫，弄得自己和女儿双双殒命，表现了劳动者无路可走的苦难。《人非人》描写一个青年妇女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悲惨命运，她要求践踏她的上级在白天能把她当作一个“人”而不可得。在这些作品中，许地山看到上流社会的穷奢极欲、为所欲为和下层群众的饥寒交迫、惨遭蹂躏，渗透着朴素的民主性思

想。

面对这样的社会人生，许地山的思想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基本上放弃了“生本不乐”那种带有佛教气息的超阶级多苦观，前期那种宿命论和逆来顺受的消极思想也随之消失，他强调用积极进取的精神来摆脱命运和礼教的束缚，争取合理的人生。小说《女儿心》和《春桃》正是这种思想转变的标志。

《女儿心》描写女主人公麟趾死里逃生，颠沛流离的生活。她还在九岁时就有了独立的人生追求。她不愿随父母“殉满庭”，在混乱中被强盗俘虏，几乎丧生；接着又成为“卖解”的女儿，尝尽艰苦；后来她得人赏识，有机会在官场中求得荣华富贵，但她对此毫不动心，只求与父亲团聚。小说以传奇的情节描写了她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毅力和奋斗精神。一年后写的《春桃》又比《女儿心》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春桃是一位刚强坚毅、爽朗豁达的劳动妇女。在她的生活道路上充满苦难，但她勇敢地向命运挑战。她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逃到北京，曾作过洋人的佣工，但她嫌洋人身上有一种像从虎狼栏里发出的臊气，就辞了工，靠捡烂纸谋生。面临艰难，她倔强地说：“谁不受苦？苦也得想法子活。在阎罗殿前，难道就瞧不见笑脸？”这种沉着乐观、对生活充满自信的人生态度，是逆来顺受的惜官和安于命运的尚洁所不具备的。更为突出的是，春桃大胆地否定了夫权，坚持妇女要有独立的人格。她向李茂和刘向高宣布：“谁底媳妇，我都不是。”她只承认李茂是她原来的“男人”，刘向高是她现在的“伙计”，坚决否定男人凭夫权独占妻子的封建习俗，并且提出：“大家住着，谁也别想谁是养活着谁。”李茂和刘向高怕别人讥笑，她教训他俩要采取“人打还打，人骂还骂”的态度。这种无所顾忌地反抗封建习俗的精神，使这个妇女形象具有惊世骇俗的进步力

量。小说令人信服地描写了李茂和刘向高二人在春桃的救助和开导下，颇为艰难的思想转变过程，最后终于听从了春桃的合理安排。这使我们从春桃身上看到了劳动妇女要求人格独立、掌握命运的坚强意志，也看到了许地山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

不过，在如何消除社会黑暗、改变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这一问题上，许地山的设想却是十分幼稚和错误的。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他仍没有超越人道主义的局限，他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同时又反对通过革命手段来推翻罪恶势力。他在《序〈野鸽的话〉》中说：“我受了压迫，并不希望报复，再去压迫从前的压迫者。我只希望造成一个无压迫的环境，一切都均等地生活着。”这表现了他“勿抗恶”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消极面，并由此走上了改良主义的歧途。他在本时期所写的《解放者》和《东野先生》就是这种复杂人生态度的表现。

《解放者》的主人公绍慈是一个救世主义者，他曾帮助孤女邦秀逃出苦海，后来邦秀参加了革命，由于革命领导人争权夺利，致使革命机关被警察发现，邦秀因党人世雄贪生怕死而被捕，绍慈为了救邦秀而牺牲。小说借绍慈救小羊羔的事例说，“羊底领袖是领着群羊去送死”，把革命行动比作一种盲目的送死行为，而把小说主人公绍慈当作拯救革命人物的“解放者”。这显然是以超阶级的“仁慈”来否定革命。

如果说《解放者》还只是以笼统的“仁慈”观念来否定暴力革命，那么《东野先生》就比较明确地提出一剂“救护时世”的错误药方了。小说主人公东野先生是一位小学教师，他生活简朴，为人正直，同情贫苦，忠于职守，并有一套“救护时世”的主张。他赞同“共产”，承认“私产和官吏是因为制度上的错误”，但不主张用革命暴力推翻这个“制度”，而是要通过教育

作为改变“制度”的“预备”，使官吏和有产者“因理启悟，去非归是”，而不能用外力强迫，“所以一个救护时世的人，在智慧方面当走在人们的前头，在行为方面当为人们预备道路”。这就是东野先生的人生信条，也是他严于律己的原因。为了反衬东野形象的高大和主张的正确，小说描写了他妻子志能从主张革命到放弃革命的思想转变，她被东野的行为感化，愿意辅助东野的事业；而另一个革命者卓斐则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小说的主旨很清楚：不能搞暴力革命，只能通过教育感化别人，为改变旧制度作好“预备”工作。这是地地道道的“教育救国论”。

应该指出在三十年代中期，许地山的思想有了明显的进步。他克服了宿命论，树立了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尤其可贵的是他看到了社会黑暗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制度。但他不了解革命的意义和革命者的崇高旨意，在作品里对革命者都作了歪曲的描写。他的“救护时世”的药方，只能是在书斋里幻想的产物而已。

一九三五年，许地山因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意见不合，愤然辞职，去香港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走出书斋，投身到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担任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这时他彻底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和罪恶，明确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坚实力量。他写了不少义愤填膺、击中时弊的杂文。他把那些贪赃枉法、卖国求荣、唯利是图的民族败类，称为“堕落在畜道上的吠家狗、引盗狗、饕餮猫、懒惰猫”，并提出要掀起一个“打狗轰猫”运动（《〈硬汉〉序》）。通过斗争实践，许地山思想有了质的变化。原先他主张勿抗恶、勿报复，现在他感到这是书生气十足的怯懦；原先他主张只要提高文化水平，剥削者就能因理启悟，社会就会变好，现在他感到如果“社会组织、经济制度”中的问题不解决，知识就等于无用，即